

江澤民講話對兩岸關係的意涵

陳 毓 鈞

(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兼美國研究所所長)

一、前 言

中共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於今(一九九五)年農曆春節除夕發表對兩岸關係的講話,在台灣引起相當迴響,媒體炒熱新聞,政學商各界人士熱烈參與討論,儘管看法見仁見智,若說反應超乎往常,實不為過。有人認為有新意,有人認為了無新意;有人說缺乏誠意,但有善意;有人說要小心笑裡藏刀,不過是中共統戰的陰謀伎倆;有人說反應過度,有人認為不必有所回應…不一而足。但不管如何,這個現象解釋了一個事實,即兩岸關係的演變發展與台灣未來息息相關,稍有差錯,都會形成危機的根源。本文擬從江澤民講話的內容來探討中共建政以來其對台政策的本質為何?若有變化,其變化是本質性的還是方法性的?江澤民講話的時機、動機、目的何在?其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何含意?

二、江澤民講話係代表中共一貫立場

江澤民的講話,在他提到八點看法與主張之前,首先指出鄧小平所制定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一系列對台政策,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指導方針,並引述鄧的說法以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分裂中國,並不允許外國干涉屬於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然後又敘述,在這一指導方針之下,十五年來在兩岸人員互訪、各種交流的發展下,已初步形成互補互利的局面。還提到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中國將相繼行使對港澳的主權。^①由此觀之,江澤民的講話,可以說是自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掌握大權以來,中共將其對台政策的原則方針,運用於實務經驗中所得出來的一個總結,充分地代表了中共領導層高度一貫和集體一致的共識,而不是標誌著江澤民個人的見解。基本上,以江澤民名義發表講話,主要是在凸顯處於後鄧時期中,中共已將解決台灣問題的議程提昇至更重要的位置,而且也顯示出迫切感。

事實上,江澤民所提的看法與主張,在過去十五年內,中共領導人如鄧小平、葉劍英、鄧穎超、胡耀邦、趙紫陽、楊尚昆、李鵬、吳學謙、閻明復、李瑞環、王兆國、唐樹備等人都曾陸陸續續地講過。不過,江的講話比較周延、全面、婉轉,跳開了

註① 聯合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五日,版二。

過去那種較為口號式和宣傳式的提法。假如說這次講話有新的看法的話，個人認為祇有兩點：(一)表示中共領導人在沒有前提條件下願到台灣訪問；(二)用孫中山先生主張將兩岸的統一連繫起來。其餘的，大致上是在重申中共對於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一貫原則和立場。現將江講話逐步解讀後，自可得到證明。

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方面，這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和官方文書強調得最多、最堅定的一項。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發表的「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②一九八一年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前夕發表的「葉劍英九點和議」，^③一九八三年六月鄧小平關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之談話」，^④一九八八年元月趙紫陽發表哀悼蔣經國先生的談話，^⑤一九八八年七月趙紫陽向前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P. Shultz)表達對國民黨十三全會的看法之談話，^⑥一九九三年九月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等，^⑦都一再明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為不變方針。還有，趙紫陽和李鵬在歷屆人大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都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立場。所以，江澤民講話旨在重申中共對一個中國原則決不退讓的一貫立場。

關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中共不加以反對這方面，其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中，敘述得已十分詳細。至於反對台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也就是白皮書中所稱的推行務實外交和雙重承認，以達到「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之目的。^⑧可見，中共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態度並無改變。

江澤民稱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中共一貫的主張。這話沒錯，自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鄧小平訪問美國向美國參眾議員宣布：「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制度」之後，^⑨中共就一直主張兩岸進行和平統一談判。「葉劍英九點和議」、「鄧小平關於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談話」、「廖承志給蔣經國的信(一九八二年七月)」、^⑩「楊尚昆接受中國時報專訪(一九九〇年九月)」、^⑪「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負責人就海峽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問題的談話(一九九一年六月)」、^⑫「國務院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等都明確地提出兩岸進行和平統一談判。不過，談判的主體由以前主張的

註② 新時期統一戰線文獻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三。

註③ *Beijing Review*, No. 24 (1981), p. 40.

註④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三〇～三一。

註⑤ 短評，中國大陸研究，台北，民國七十七年二月，頁一。

註⑥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

註⑦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

註⑧ 同註⑦。

註⑨ 直雲，鄧小平外交生涯，香港，鏡報文化公司，一九九四年，頁一八八。

註⑩ 同註⑨，頁一九三～一九四。

註⑪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七日。

註⑫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

「兩黨談判」進展為「可以吸納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然而早在一九九〇年三月，八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鵬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聲稱：「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我們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我們願意同台灣各個黨派、團體和各界有識之士加強聯繫，各抒所見，共商國家統一大業。」^⑬

所謂「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提法，國內有人認為這含有新意，其實不然。楊尚昆於一九九〇年九月接見中國時報採訪團時，已經說過：「台灣是自己同胞，打自己同胞有甚麼意思？」^⑭一九八八年八月，大陸成立全國性的台灣研究會，同月十二日，時為中共統戰部長的閻明復向出席「台灣同學會學術討論會」成員講話時就說：「中共始終堅持用和平解決問題，怎能再讓中國人打中國人呢？」^⑮這種「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提法主要是針對「台灣獨立」的圖謀，而且因為顧慮「台獨」的可能性，使北京不能承諾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此即中共歷年來不肯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解釋邏輯，自鄧小平以迄江澤民都是如此。

說到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和合作以利兩岸經濟共同繁榮，有人認為這是中共對台灣搞「以商促政」，其實也不是完全如此。兩岸經貿往來在一九八六年尚不足五十億美元，如今已接近二百億美元，有大約二萬家台商在大陸設廠投資，台灣已成爲大陸第四大貿易伙伴。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調查指出，在可預見未來，中小企業赴海外投資仍以大陸地區爲優先考量者占絕大多數。^⑯江澤民的主張不過是反映了兩岸間的經濟現實，而且未來在這方面的合作還會持續擴大。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可·華萊士（Mike Wallace）的問題就直言：「根據大陸的現行政策，發展速度不會慢，距離正在縮小。我相信大陸在若干年內至少不會低於台灣的發展速度。道理很簡單，台灣資源很缺乏，大陸有豐富的資源，如果說台灣已發揮了自己的潛力，大陸的潛力還沒有發揮，肯定會很快發揮出來的。」^⑰所以鄧小平建議美國政府鼓勵台灣與大陸三通，爲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問題創造條件。根據鄧小平構想，中共國務院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四日，通過「加強對台經貿工作的通知」，要求：（一）積極擴大對台貿易；（二）認真做好吸收台資工作；（三）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四）加強對台經貿管理和協調。^⑱一九九四年，中共全國人大通過「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將兩岸經濟關係引向法制化的發展。^⑲至於兩岸商談並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王兆國在接見台灣若干工商訪問團時，亦曾表示願予考慮。

國內不少人認爲江澤民提出兩岸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中華文化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中共的讓步，是過去所沒有的。事實上，

註⑬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註⑭ 直雲，前揭書，頁一八八。

註⑮ 重要敵情通報，台北，中央大陸工作會，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註⑯ 青年日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版六。

註⑰ 鄧小平，前揭書，頁一七二。

註⑱ 陳德昇，兩岸政經互動，台北，永業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頁二〇七～二一二。

註⑲ 同註⑱，頁二四七～二五三。

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中，中共已逐漸且悄悄地放下共產國際主義，轉而緊抓民族主義。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時，胡耀邦已提出「毋忘團結奮鬥，致力振興中華」的說法。開始重視儒家學說，恢復傳統節慶，全力整理文史典籍，將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三國演義等小說拍成電視影集，向全國播放，足證確實已在向中華文化回歸。一九八八年九月，趙紫陽向來訪的美國務卿舒茲表示兩岸有三點共識：(一)都堅持一個中國；(二)都需要發展相互合作，共同發展民族經濟；(三)都需要繼承和發展我們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②①}顯然，江澤民的主張並非新創，它代表了大陸社會重新認同中華文化的潮流趨勢。

江澤民談到兩千一百萬台灣同胞，都是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都是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這一段話，提法溫婉，充滿感性，但實質上就是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四月的一次談話中所言：「我們允許台灣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甚至允許保留自己的軍隊」之觀點。^{②②}這個想法後來更加週延、具體地反映在「葉九條」和「鄧六點」中的「一國兩制」構想。此構想在國務院所發表的白皮書中，也有十分詳細的說明。江講話不用「一國兩制」名詞，顯然清楚台灣對「一國兩制」構想尚有極大疑慮，故而避開。不過，這並不表示江澤民會放棄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最後，江澤民表示歡迎台灣當局到大陸訪問，也稱北京領導人願接受邀請前往台灣。早在一九八一年十月，胡耀邦在北京「紀念辛亥七十週年」大會上，已公開邀請蔣經國等十四位軍政首長及各界人士到大陸訪問。^{②③}另外，楊尚昆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曾表示他願接受邀請前往台灣訪問，但要保證他的安全。這次，江澤民不再談前提條件，祇要台北願意邀請，就準備前來交換意見，共商國是。然而，江也藉此婉拒和台灣當局在第三國或國際場合見面，仍是中共反對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一貫立場。

三、毛、周時代的對台策略

自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政以迄一九七六年毛、周病逝的期間，中共的對台政策主要是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擔綱決策。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全部中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②④}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總統 (Harry Truman) 宣布不再援助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聲明決不再介入中國內戰，並暗示中國新政權對台灣享有主權。^{②⑤}同年三月和五月，中共軍隊

註②①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

註②② 直雲，前揭書，頁一八八。

註②③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

註②④ 引自程林勝，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二〇五。

註②⑤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531.

相繼占領了海南島和舟山群島，大軍集結南方準備對台灣發動總攻擊。不料，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介入台灣海峽，杜魯門政府執行「台海中立化」政策外，並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²⁵接著「中」美軍隊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美國回頭協助國民政府，產生了中共所認為延續中國內戰、阻撓中國統一的台灣問題。

中共介入韓戰後，周恩來認為韓戰對中共而言，不單是朝鮮問題，連帶的是台灣問題。²⁶一九五三年，韓戰停火協定簽署，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使中南半島戰火暫時停息，中共的焦點再度轉向台灣。針對中美可能締結共同防禦條約和艾森豪政府正暗中進行「兩個中國」的做法，中共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初炮轟金馬，出現第一次台海危機。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之後，周恩來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二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會中聲明：「堅決要求美國從台灣、澎湖和台灣海峽撤走它的一切武裝力量，停止侵犯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²⁷一九五五年元月，中共以武力占領一江山島和大陳島作為回應。因此，從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五五年初，可以說是中共對台政策的第一階段，特徵是通過武力方式來實現解放台灣，完成中國領土的統一。

第一次台海危機中，中共看到台北和華府為了金馬防衛問題出現摩擦矛盾，而它自己也體會到軍事手段的有限性，若要有效突破美國的圍堵與孤立，外交上也必須能有所行動才行。因此，周恩來利用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宣布中共願和美國談判以緩和台海地區的緊張局勢。²⁸由於中共態度的轉變，艾森豪政府也歡迎和平談判，促成同年八月「中」美間的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台海危機才落幕。

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在中共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報告，提出了「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的口號。同年六月，周復在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代表中共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它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²⁹另外，毛澤東早在同年四月已先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主張，隨後在七月底發出「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指示」，工作重點是爭取台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包括蔣中正與蔣經國。³⁰至此，中共對台政策正式轉入第二階段，特徵是強調在可能條件下，「爭取和平解放台灣」。易言之，即由原來用武力「一定解放台灣」，變為在一定條件下「爭取和平解放台灣」。

一九五〇年元月，杜魯門政府宣稱打算放棄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並通知菲律賓政府準備接納蔣中正的「流亡政府」後，蔣總統深感孤立無援和悲憤之餘，決定派人與

註²⁵ FRUS, 1950, Vol.7, pp. 105~161.

註²⁶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五二~五三。

註²⁷ 引自程林勝，前揭書，頁二〇七。

註²⁸ *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二卷下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二二五〇~二二五一。

註²⁹ 引自程林勝，前揭書，頁二〇八。

註³⁰ 引自陳德昇，前揭書，頁五；程林勝，前揭書，頁二〇八。

中共談判。同年六月一日，李次白作為蔣的密使返回大陸，與中共當局協商國共再次合作事宜。這次秘密談判因韓戰爆發，美國再度介入國共內爭，蔣主動放棄談判而作罷。^①不過，嚴格來說，這次密談並非真正的談判，因為雙方實力懸殊，而且中共已做好武力解放台灣的準備。倒是周恩來公開提出和平談判的建議後，台北當局有了正式的回應。

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央通訊社資深記者曹聚仁受台北當局委託，前往北京探詢究竟，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接見曹，周對曹說：「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甚麼不可以合作建設呢？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它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②隔了數月，一九五七年春天，蔣中正挑當時任立法委員的宋宜山前往北京進行密談。周恩來接見了宋宜山，代表中共向國府提出和談的具體建議：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台灣地方政務仍歸蔣先生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去干預，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府的領導，但外國軍事力量一定要撤離台灣海峽。^③然而，由於當時冷戰的國際形勢，加上種種其它原因，談判没能繼續進行下去。

一九五八年夏天，毛澤東利用中東危機，發動「八二三炮戰」，但面臨美國在台海迅速集結龐大的海空軍力量，不得不知難而退。不過，毛卻利用台北與華府因金馬防衛問題所產生的爭執，提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的呼籲。當然，中共以武力手段為主，而和平談判為輔的策略，祇是增加台北當局更深的疑慮。一九五九年，中共武力鎮壓西藏反抗運動之後，使得兩岸進行和平談判的可能性幾近於零。一九六二年夏天，反而是蔣總統鑒於中國大陸因中共的大躍進政策，正陷於深刻的危機。因此召集部隊，準備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後由於美國的反對而放棄。^④

整個六〇年代期間，國共雙方在台灣海峽形成不戰不和的局面，主要是中共內部的困難所造成。尤其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長達十年的文革動亂，使得中共在解決台灣問題上並沒有甚麼新的設想和變化，仍然是立足於用武力來為解放台灣作準備，但同時不放棄和平爭取。「四人幫」垮台後，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共集中力量於內部整頓，加上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權力鬥爭，其對台工作也無法進展。一九七八年底，中共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重掌大權並達成「中」美建交，中共的對台政策在鄧小平親自主導下，確立以和平統一為主的戰略方針，而進入到新的階段。這個新的發展，亦就是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上由「一國一制」轉向「一國兩制」。^⑤

四、一個中國係對台政策的核心本質

註① 直雲，前揭書，頁一八一～一八二。

註② 同註①，頁一八二～一八三。

註③ 同註①，頁一八三～一八四。

註④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67), pp.318~319.

註⑤ 程林勝，前揭書，頁二〇九。

中共的建立是「五四」後中國若干知識分子在面對帝國主義侵略而中國無力反擊的情勢下，爲了救國救民而認定除效法蘇俄外別無他途可循。³⁶反帝是爲救中國，這是中共具有「中國屬性」的一面，儘管共產黨講求的是國際主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運動也是一種民族主義運動，「五四」以前，中山先生對英、美等西方國家是抱有期待的。但「巴黎和會」將山東權益劃予日本後，中山先生進一步地認識到西方國家的侵略本質，因此斷定非用軍政手段不足以爲功，是以採取聯蘇策略，提出反帝主張，唯排除強權在中國的宰割，中國才能成爲一個獨立並統一的國家。這種中國屬性的共通點，也就是國共能夠進行二次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早期中共受到蘇聯的影響很大，獨立自主性甚弱而民族性亦難彰顯。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毛澤東取得領導權以後，中共對蘇共的自主性和民族性便逐漸顯現出來。抗日時期美國駐華外交官和軍事人員有不少人認爲，中共是獲得人民支持的土地改革者，共產主義成分少而民族主義成分多。³⁷國共內戰期間，杜魯門政府也期待中共會成爲南斯拉夫的狄托·艾奇遜（Dean Acheson），更相信中蘇共之間會有天然的矛盾來自於民族主義情結。³⁸儘管中共在一九五〇年宣布一面倒向蘇聯，但是並沒有改變多數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認爲，中蘇共必然分裂的看法，包括杜勒斯（John F. Dulles）在內。³⁹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中蘇共關係從摩擦爭執而終至全面決裂，其重要形成的因素之中就包含著民族情結和國家利益在內。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宣稱：「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⁴⁰這句話最足以代表中共想讓中國成爲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國家之願望。一九五〇年，正當中共擬渡海解放台灣，實現中國統一之際，美國介入了國共內戰，終於產生了中共所耿耿於懷的台灣問題。第一次台海危機中，北京和華府都願坐下來談判之時，毛、周就解決台灣問題的性質立下規範：（一）我們願同美國談判，也願同蔣介石集團談判，前者是國際性質的談判，後者是屬於內政性質的談判；（二）這兩種談判可以平行或者先後進行，但性質不能混淆；（三）和美國談判不是停火問題，而是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情勢，中國不同美國談停火，主要是不能承認美國侵略台灣的合法性和「兩個中國」。⁴¹這個規範的原則很清楚，即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涉及國家主權，故不容外國干涉。易言之，這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之由來，中國必須統一，內

註³⁶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一九七一年，頁七九～八〇。

註³⁷ 邵玉銘，中美關係論文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二九。

註³⁸ 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美國政策與看法，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分裂中蘇的楔子戰略」，哈里·哈丁，袁明主編，中美關係史上沈重的一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二五五。

註³⁹ 同註³⁸，頁二六二。

註⁴⁰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五。

註⁴¹ 鄭宇碩，石志夫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稿，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頁二〇七～二〇八。

政不容干涉，主權不容分裂。

中共對一個中國的堅持是十分嚴肅和認真的。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魯雪夫第二次訪問北京，建議「中」蘇雙方成立一個聯合艦隊並在大陸設長波電台。毛澤東拒絕此一建議，因為接受的話中共就失去了反對美國在台灣建立基地的正當性。^{④②}「中」美軍隊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後，美國全力圍堵中共，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繼續維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中代表中國。六〇年代開始，美國轉變對華政策方向，採取不再反對北京進入聯合國的「兩個中國」政策，不但台北反對，北京也堅決反對，並主張其進入聯合國的先決條件是台北必須退出聯合國。最近去世的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在其回憶錄中就承認雖然他曾推銷「兩個中國」，但是註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兩個中國」都反對。^{④③}一九七二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大陸，而「上海公報」得以發表的主要原因係美國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且尼克森向毛、周承諾：(一)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二)不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三)將在能力所及範圍內勸阻日本進入台灣，也不鼓勵日本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四)支持任何關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五)尋求中美關係正常化，並在四年內逐步從台灣撤走軍事人員和措施。^{④④}

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問題一直就是「中」美兩國間最棘手的問題。參與「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談判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海格(Alexander Haig)都一致承認，台灣問題是他們同北京當局談判時最難處理的問題，因為中共的立場相當明確，十分堅決，即中國祇有一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美建交後，中共對美國所制定的「台灣關係法」一直公開否定。一九八六年九月，鄧小平告訴美國記者華萊士時就說：「如果說中蘇關係有三大障礙，中美關係也有障礙，就是台灣問題，就是中國的海峽兩岸統一的問題。」鄧並表示，希望雷根政府在這個問題能有所作為。^{④⑤}

毛澤東曾經告訴尼克森說，作為共產黨員，他痛恨蔣中正；但身為中國人，他尊敬蔣。^{④⑥}魯斯克在他回憶錄裡也談到，他曾和蔣總統討論關於美國援助國府軍隊的問題，蔣就清楚表示美國不能用核子武器對付大陸的中國人。^{④⑦}兩次台海危機期間，美國一再試圖說服蔣自金馬撤軍，並盼蔣接受「兩個中國」的設想，但皆為蔣所堅決反對。^{④⑧}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蔣經國先生對英國觀察報記者表示：「如果中國大陸遭到入侵，台灣絕不會加以利用，也不會袖手旁觀。…凡是入侵大陸的人，都是我

註④② 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三五六。

註④③ *聯合報*，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版三九。

註④④ *新中國外交風雲*，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第三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八九~九〇。

註④⑤ 鄧小平，前揭書，頁一六九~一七〇。

註④⑥ Richard M. Nixon, *Leader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2), p. 254.

註④⑦ 同註④③。

註④⑧ 陳毓鈞，「台海危機與美國干預」，*美歐月刊*，台北，第十卷第一期，民國八十四年一月，頁四~二三

們的敵人。」^④

兩位蔣先生堅持一個中國的民族主義立場，都受到北京當局的高度評價並認為是兩岸統一的根本基礎。一九八八年元月，中共由趙紫陽以總書記身分發出唁電，對經國先生逝世深表哀悼，並發表談話說：「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更表示要向歷史負責，並為兩岸關係的緩和作了一定努力。」^⑤所以說，台北當局肯定一個中國的原則，正是北京當局認為中國的統一可以透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的關鍵。

從毛、周時代到鄧小平時代，中共為解決台灣問題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圍繞在以一個中國的原則為核心而建構的，因此就體現在今天對台政策的五個方面：(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所以反對「兩個中國」或「階段性兩個中國」；(二)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故反對「台灣獨立」；(三)兩岸關係應該走向統一，而非長期分裂；(四)兩岸有一個中國的共識，故可透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五)不能承諾放棄武力方式，是在防阻台灣自中國領土分離出去。因此，假若認為鄧小平這一代領導人去世之後，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會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鬆綁，那將是一個錯誤而浪漫的想法。

五、江講話的動機與目的

江澤民為甚麼在一九九五年元月提出這個講話？有人認為江為了鞏固他在後鄧時期中的權位，故想藉在對台政策的發言來樹立權威。假如這種看法站得住腳的話，那立即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或對台政策）係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根源之一，或者是各派系會運用它作為權鬥的工具。個人對上述的認定持保留的看法，因為：(一)中共領導人之間，從第一代到第三、四代，彼等對台灣問題的看法非常一致，有很高的共識，所以其對台政策就保持著相當高的連貫性；(二)中共歷次的權力鬥爭中，我們並未發現台灣問題曾成為權鬥的根源或導火線；(三)共產黨以外的民主黨派及各階層人士，對「台灣歸回祖國，實現中國統一」也有很強烈的願望，社會共識很高，難起爭議。據此，江澤民若失勢，不會因台灣問題而導致，接替江的新領袖也會維持對台政策的一貫性。

中共是一個講求形勢與謀略的政權，形勢不利時，態度隱忍，形勢有利時，就主動積極。「六四事件」和東歐共產政權瓦解之後，鄧小平就告誡中共幹部：永不稱霸；永不當頭。^⑥江澤民在一九九五年開始不久，發表對兩岸關係的講話，在動機上是利用形勢，在手段上是運用「先發，制人」的謀略。首先，一九九四年兩岸關係是自一九八七年以來最緊張最惡劣的一年。當兩岸因「亞銀事件」對抗到最高潮之際，中華奧會主席張豐緒卻到北京與江澤民見面，不久李登輝也表示願與江澤民見面，十一

註④ 引自程林勝，前揭書，頁二三二。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鄧小平，前揭書，頁三六三。

月中旬辜濂松所舉辦的「台北圓桌會議」上又傳出「李江會談」的聲音。在北京看來，既然李已表示願見江，那中共何不順水推舟，促成「李江會談」？

其次，台北已積極的著手籌建亞太營運中心，此一中心要能有效運作，並吸引外國投資和支持，就不能不與大陸進行直接三通。在這一點上，中共是處於有利的位置，因為台灣無法自絕於大陸經濟的發展。再者，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祇剩兩年餘，而華航和國泰的航約將於今年中到期，未來台港航線如何進行，主導權掌握在中共手上，形勢也是有利於北京的。最後，未來一年中，台灣將有立委和總統兩項重要選舉，其結果可能會衝擊兩岸關係，中共言明在前，表達了中共所能接受的最後底線，好言相勸台灣不要踰越兩岸的政治警戒線，以達事先防範之效。

另就發表談話的目的而言，個人認為除了再度重申中共基本的一貫立場外，也在回應，或者可以說是回答去年兩岸關係互動中的一些問題。其可以分為下列數點：(一)表示不能接受台北所提出的「階段性兩個中國」和「分裂國家」的觀點；(二)無法同意李登輝所提出的在國際場合見面的看法；(三)由於去年台灣省市長選舉中出現「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主張，江特別指出台灣二千一百萬同胞，不管是本省籍或大陸籍都是中國同胞，從而宣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也顯示當出現不是中國人的「台獨」時，中共沒有義務遵行上述承諾；(四)針對近年來台灣出現的「台灣文化不屬於中華文化」的言論予以否定，特別強調中華文化的重要性，並有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華文化正統的企圖；(五)再度表達進行和平談判不必預設任何條件，間接否定國統綱領三階段的提法。

江澤民以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身分發表對兩岸關係的正式談話，確實是過去所沒有。以這種身分發言，一方面是在於提昇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在於凸顯江澤民擬與台灣領導人直接對話的意願。不過，這種做法也正顯示著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對於解決台灣問題有著迫切感。江講話發表之後，曾是江的老師也是上海前輩的汪道涵（中共中央台灣工作小組成員之一兼海協會會長）引用鄧小平指示說，中共在世紀之交要完成五大任務，其中之一就是促進兩岸和平統一。^{⑤②}中共人大委員長兼政治局常委的喬石在去年年底曾於內部會議中表示：除非儘早解決台灣問題，否則中共仍會受制於美國的壓力。^{⑤③}

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一月曾提出八〇年代中，中共所要做的三件大事是：(一)反對霸權主義，維持世界和平；(二)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三)加強經濟建設。^{⑤④}目前，九〇年代已過了一半，台灣問題的解決仍無著落。今年是二次大戰結束五十週年，也是日本把台灣歸還中國的第五十年，但中國卻尚未統一，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能夠毫無著急感嗎？

註⑤② 聯合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大陸版。

註⑤③ 同註⑤②。

註⑤④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二〇三～二〇四。

六、結語

江澤民說他的講話是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這是正確的。後鄧時期中共的最高決策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集體領導。目前，重大決策都是由政治局七位常委集體決定，即使不集會時，有關文件也都在七位常委手中流傳。⁵⁵自然，這一次中共對台政策的重大宣示，決不是江澤民個人意志的展現，以及其主觀看法的表達。因此，台北在看待江講話時，不應過度偏重於江個人的因素，而必須重視的是中共對台政策的本質核心為何，以及提出的動機與形勢之間的關係為何，方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台灣問題的形成，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二次戰後國際政治的歷史所造成，兩岸關係若要擺脫歷史因素，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兩岸關係是一個歷史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現實問題。由於它是歷史問題，所以無法用割斷歷史的「台獨」主張來解決；復由於它是現實問題，所以台灣地區二千一百萬人的想法與權益就應該被尊重和保障。「江八點」要求兩岸進入談判的時代，「連四條」宣稱兩岸已進入協商時代，這都是朝向正確方向的眼光。個人認為，兩岸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即將到來，凡是有助於雙方關係的和平、穩定、繁榮之辦法都應加以嘗試，以耐心、耐煩、耐力來追求兩岸的長遠合作與永恆和平。

*

*

*

註⁵⁵ 聯合報，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大陸版。